



红色记忆

张天虚：抗战文坛上的一员战将

中共党员、青年作家张天虚驰骋抗日战场，创作了300多万字的文艺作品和战地通讯，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茅盾评价说：“那时（指去世）他还不到30岁！假如他活到今天，一定是革命文坛上的一员战将。”

张天虚原名张鹤，字友松，又叫剑平。1911年12月8日出生在云南省贡县龙街。他在云南省立第一中学和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读书期间，参加了云南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努力会和娱乐会，从事革命活动，与聂耳成为莫逆之交。1930年，为躲避反动当局迫害，他与聂耳相继前往上海。在上海，他先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并创作出版了47万字的长篇小说《铁轮》，描写了潘祥生由贫苦农民成为红军战士、王振武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过程。《铁轮》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进入“新的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延安成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中心。张天虚根据党组织安排奔赴延安，参加了丁玲任主任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担任通讯股长。8月15日晚，延安各界在大礼堂举行欢送西战团奔赴抗日前线的晚会。毛泽东出席了这一晚会，作了热情洋溢的致辞，鼓励大家用自己的笔、自己的口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努力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争取抗战胜利。“我们战地服务团的组织虽小，但是他好像小河流一样慢慢流入大河，汇集着若干河的水，变成了一个洪流，我们誓死要打退日寇，如不达到此目的，决不回来与诸位见面。”丁玲代表西战团全体人员表达了决心。

欢送会之后，西战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延安做了40天的准备工作。在这40天内，他们积极排练了十几个独幕剧，此外还编排了秧歌舞、大鼓、歌曲、相声、绘画等。为了提炼宣传内容，他们还在延安街头演出征求各界的意见，再根据群众反映，不断改进、提高。张天虚创作了一个宣传全民抗战思想的独幕话剧《王大爷》，主题是号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全民参加抗战。丁玲在剧中扮演一个八路军政工人员。当毛泽东看完演出后得知编剧是张天虚时，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支钢笔赠送给张天虚，以示奖励。

9月22日，西战团40多人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一路上，他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他们利用山西、陕西村村都有戏台作为宣传讲坛，运用大鼓、快板、双簧、相声、活报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抗日救国的

大道理深入浅出地宣传给群众。每次演出结束后，观众们迟迟不肯散去。在此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军训日记》《西线生活》《两个俘虏》《雪山道中》等报告文学和战地通讯，为抗战史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两个俘虏》是一篇2.5万字的报告文学。这是张天虚在西战团的“一部经验的实录”，已编入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战地生活丛刊》中。茅盾评述说：“《两个俘虏》是第一次把一个值得我们用全力钻研的问题提出来了！抗战已经一年，但是我们对敌的研究工作，做得实在太少。一般的文艺作品，写到敌人的士兵时，不是写成怕死的弱虫，就是喝血的猛兽。至于宣传上或可收一时煽动刺激之效，然而宣传应该是教育，把敌人估计得太高或太低，都不是教育民众的正轨。这篇报告文学，揭示了敌军士兵的心理，指出了他们曾经怎样被欺骗与麻醉，但也指出了欺骗与麻醉终于经不起正义真理的照射……在这里，就有我们长期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的正确理论之事实上的明证——两个顽强的俘虏终于感悟而调转枪口了。”

1938年4月，由滇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第60军奉命参加台儿庄战役。184师师长张冲与师政训处主任张永和（中共地下党员）来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多次与周恩来、叶剑英、罗炳辉秘密会晤，请求中共选派工作人员到184师工作，而且要求是云南籍人，以加强该师政治、军事力量。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与延安联系后，决定抽调张天虚、周时英、薛子正、蒋南生、张子斋、尹冰等赴184师。在延安临行前，朱德教他们如何工作，如何团结抗日力量，并和他们合影留念，朱德还送给张天虚一部留声机，好让他开展工作。

在184师驻地鸡公山，张天虚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张冲见面。初到之时，就做了些“交朋友”的活动，团结了一些进步抗日青年。他们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丰富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张天虚在这次战斗中，更深刻地感受到张冲的果敢指挥，看到了滇军的英勇无畏，他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杀过单城集》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

部队突围后，来到汉口东南的宋埠整编待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正在组织许多演出队宣传抗日。张天虚和蒋南生邀请了陆万美任队长的第6演剧队来184师演出。其中

向徐州进犯的日军。张天虚非常勤奋和勇敢，经常冒着枪林弹雨深入战壕采访战士，收集资料。张冲曾说：“天虚虽是捻笔杆子的，但打起仗来比我还英勇胆大”。张永和也说：“天虚无论行军还是驻防，抑或战斗间隙都坚持记笔记。禹王山战斗中，他是最勇敢的。”在一次战斗中，战士们面对日军的坦克，毫不畏惧，抱起集束手榴弹，高喊着“活捉铁乌龟”，前仆后继向鬼子坦克冲去。张天虚被战士奋不顾身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写下了战地通讯《活捉铁乌龟》，发表在《抗日军人》上，使战士们深受鼓舞。在禹王山争夺战中，184师的勇士们不怕牺牲，奋勇向前，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始终坚守在禹王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禹王山脚下的运河水。张天虚据此写下了报告文学《运河血战》。在禹王山阻击战期间，张天虚写下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如《台儿庄通信》《记张冲师长》《血肉筑成的长城》《指挥所里》等，除发表在《抗日军人》上外，还分别发表在《云南日报》和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

1938年5月18日，第60军奉命撤离台儿庄及禹王山，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在突围转移和频繁的战斗中，张天虚宁可扔掉穿的和吃的东西，也不舍得丢掉日记本，他在黑暗中写下了许多血与火的篇章。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战地通讯《火网里——鲁、皖、豫突围之一》，他在文中写道：“我把一本还没有丢掉的敌人日记，当中有3页空白的，便在一页上摸索地写了：同志们，请转告我所有的同志和朋友，不要念我，加强斗争的决心和信念，相信中华民族是在艰难困苦和错误当中挣扎进步和健全起来。争取最后的胜利，我们有充分的把握。踏着我们的血路来！我把它撕下夹在口袋里。全身烧着杀敌的热火，眼睛搜索着前面，轻轻地放着步子。”

部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艰难突围。张冲总结经验教训，命令部队在拂晓前开拔，因为此时是敌人最麻痹的时候。果然，他们在一个叫徐芦的小村附近，打了一个漂亮仗。张天虚在这次战斗中，更深刻地感受到张冲的果敢指挥，看到了滇军的英勇无畏，他写了一篇战地通讯《杀过单城集》发表在老舍主编的《抗战文艺》上。

部队突围后，来到汉口东南的宋埠整编待命。第三厅厅长郭沫若正在组织许多演出队宣传抗日。张天虚和蒋南生邀请了陆万美任队长的第6演剧队来184师演出。其中

有一个节目《沙家店》，反映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方和反奸斗争，部队对这些节目评价很高。借此机会，张天虚、周时英向张冲提出成立自己的演出队，张冲对此大加赞赏，给予大力支持。蒋南生到汉口找到青年救国会的负责人何礼，挑选了10多名有文艺专长的青年组成演出队，取名为“随军工作团”。

1938年9月至10月，张天虚随184师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在阳新、排市战斗中，给日寇以重大杀伤。

三

1939年初，张天虚回到昆明后，在登华街竹子巷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址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他曾在《云南日报》副刊《南风》当过编辑，并给《南方》《战时知识》等进步刊物撰写杂文。

不久，张天虚接到组织通知，被疏散到晋宁盘龙寺附近的省立昆华师范学校任语文教师。教学中他不断激发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带领学生出墙报、写文艺习作，到附近村庄参加田间劳动以体验农民生活。该校的三青团负责人兼校长叫王振，对他不满发展到排斥。未满一年教书生活的张天虚只得离去。

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开明民族资本家苏萃农在个旧创办了《曙光日报》，宣传抗战和统一战线，任命张天虚为主编。可张天虚因身体虚弱未能到职，待病稍好后，他又接党组织指示，先后到南洋及缅甸仰光，任《中国新报》编辑。他经常到华侨中去演讲，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在此期间，他为《中国新报》等撰写的社论、文艺作品在百篇以上，同时还完成了一个10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五月的麦浪》初稿，后连载在马仲明主编的《云南日报·昭通版》上。由于繁重的工作，张天虚的健康再次受到严重影响。1940年底，党组织派人从仰光把张天虚护送回国，在昆明云南服务社休养数日后，即回到呈贡老家疗养。郭沫若在为张天虚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力疾服务，勤劳有加，尽力启发侨胞，打击敌伪，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矣。不幸疾转剧，咯血过猛，曾日月昏睡，失去意识，乃不得不回乡疗养。”

1941年8月10日，不足30岁的张天虚因病情恶化，不幸在昆明去世。郭沫若为其墓碑上作铭曰：“西南二士，聂耳天虚。金碧增辉，滇洱不孤。义军有曲，铁轮有书。弦歌永代，永示壮图。”

（据《民主协商报》）

傅斯年留学的曲折经历

五四运动一个多月后，北大校长蔡元培被迫辞职，学生领袖之一傅斯年也于这年夏天毕业回到家乡聊城。

1919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的官费留学生。傅斯年欣然赴省会济南应考，并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登榜。傅斯年开始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但当权者以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而且还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等为由，拒绝录取。

此时，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叫陈豫的科长，为傅斯年据理力争，坚持以考试结果为准，并直言道：“如果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而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一些良知未泯的官员，也趁机出面为傅斯年大鸣不平。在社会的舆论声中，当权者只得作出让步，把傅斯年列入官费留学生名单。正在济南一间小旅馆的傅斯年得此喜讯，当场喊了一声：“我的亲娘！”

就在傅斯年动身之前，蔡元培在学界的呼吁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重返北大任职。傅斯年到北京大学同好友告别时，与蔡元培相会。蔡元培专门为他题写了“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的对联，希望他能学有所成，傅斯年深受鼓舞。

1920年新年伊始，傅斯年从北平到达了上海，再乘轮船赴英国，开始了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据《人民政协报》）

清介重厚说窦仪

赵匡胤之所以能坐上九五之位，成为宋朝开国之君宋太祖，赵普功不可没，所以赵匡胤上位不久，即重用赵普为宰相。不想赵普任相后，居功自傲，擅势专权，又收受贿赂，培植党羽，宋太祖深感忧虑。倘若以皇帝身份直接罢黜处罚赵普，朝野间定会说道三道四，什么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类，于社稷不稳，于声名不利。而且，赵普毕竟有从龙之功，对自己的家族也算竭尽全力，不宜自己出面大动干戈。

为此，赵匡胤想了一个办法，让翰林学士窦仪出面。窦仪是老臣，齿德俱尊，让他出面弹劾赵普，灭一下赵普的威风，撼动一下他的地位，自然能打击赵普的嚣张气焰，也更有说服力和威慑力，自己作为皇帝，再顺势给予处理，这样既不用担心风言风语，又能达到目的，是颇为稳妥的。

某日，赵匡胤召来窦仪，寒暄过后，谈及赵普，说他如何目无法纪，如何专横跋扈，长此以往，于江山社稷不利云云。赵匡胤喋喋一大通之后，静候窦仪的响应，以引出更多对赵普不利的话题，如此便顺水推舟，水到渠成。窦仪作为自己手下的“笔杆子”，属近臣心腹，当心腹神会。况且，当时关于窦仪可能任相的传闻亦多，自己也早有此意，只要他顺着杆子爬，说不定赵普离任之际，就是窦仪上任之时。

但是，让赵匡胤大出所料的是，窦仪听完他一番谆谆之语后，不仅没有借机批评赵普，反而盛赞赵普公忠亮直，功劳卓著，这令赵匡胤非常不快。但不快归不快，总不能因他没附和你就随意处罚吧。于是，窦仪因没有没有在皇帝与宰相的矛盾中找准位置，顺势而为，给自己招来了皇帝的的不满，后来果然没能当上宰相。

当然，皇帝要处理人，不会因为窦仪的抗节不附而搁浅。后来，赵匡胤又召来同为翰林学士的卢多逊。卢多逊与窦仪最大的不同是，他更有心机，更喜进用，为一己之利可以毫无底线地使绊子、放冷箭。因此，皇帝一个暗示，卢多逊立刻领会，“遂攻普之短”，赵普随即被罢相外放。赵普外放后，卢多逊先被提拔为副宰相，不久又被重用为宰相，一切顺理成章。

赵匡胤去世后，其弟宋太宗赵光义上台。因为朝野间关于他上位不正的风言杂议很多，“斧声烛影”传得绘声绘色，所以赵普被重新召回，与卢多逊并列宰相。不久，即有人状告卢多逊结交攀附太祖、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且对赵光义出言不逊，卢多逊因此遭三代削爵、全家流放处罚，最后忧愤成疾，死于流放之所。

据宋人江少虞的《宋朝事实类苑》记载，窦仪婉拒赵匡胤拉拢后，回到家曾同他的弟弟们谈及拒绝的原因时说：“我必不能做宰相，然亦不诣朱崖（今海南海口，泛指流放之地），吾门可保矣。”意思是说，我拒绝了皇帝，当然不可能成为宰相，但也不至于被问罪，受到流放的处罚，一家老小可保无虞。

官场是个大染缸，在这个染缸里染了数十载的窦仪，面对极大尊荣的诱惑，还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实属难能可贵。他清楚地知道，通过打击同僚来换取步步高升和荣华富贵，不但手段卑劣，自己也会因此陷入权力斗争而不能自拔，他人的今日，或许就是自己的将来。“内朱崖”只不过是时间的先后而已。若想“不诣朱崖”，唯有坚守内心，顺其自然，才能避免兔死狐悲的后果，保证自己和家人的一世平安。窦仪是这样做的，结果也如他所言，虽未拜相，但也未贬官，逝后还追赠右仆射，也算平安着陆，高位善终。（据《天津日报》）

古代的腊月生活

腊月就是农历十二月。中国民间在腊月就忙着辞旧迎新了。

在古代，“腊”指的不仅是腊月初八这天，还包括腊月十八和二十八，也就是说，只要是腊月逢八的日子，都被古人称为“腊八”。不过，只是在腊月初八吃腊八粥。

腊月初六是古人敬“土地神”的日子，人们在这一天都祈求来年能够五谷丰登，风调雨顺，有一个丰收年。

到了腊月二十三日，送“灶神”上天，因此，这天又称为“祭灶日”。传说所有住在人间的灶神这天都要去天上拜见玉皇大帝，汇报各自所在的人家一年来的善恶功过，根据他们的汇报，玉皇大帝给这些人安排来年的善恶吉凶。所以，古代腊月二十三一到，家家户户都要烧纸马送灶神，用糯米汤圆、糖瓜等甜甜粘粘的食物堵住灶神的口舌，粘住他们的牙，让他们能够“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但是，一般人家祭灶，简单得很。北宋时期的宰相吕蒙正在做官之前，家贫如洗。在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夜，就用清水一碗、诗一首，祭拜一下灶神便算了事，诗曰：“一炷清香一碗泉，灶君司命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蒙正文章不值钱。”万后感慨，溢于言表。送灶神时的炭火在熄灭之前，人们常常把燃烧着的树枝取回，放在炉子里，因此，这天也被古人称为“新火节”，意思是新的一年开始，一切都是崭新的，包括炉子中的火也是崭新的。

腊月的最后一天就是除夕，除夕又被称为“岁除”或“逐除”，意思是说，旧的一年，年到此夕而除，明天就更换了新岁，新的一年要真正开始了。

在我国南方的传统习俗中，到了除夕之夜要吃团年饭，而北方，除夕却多吃饺子。北方有谚语说：“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合子团团转。”过年吃的饺子，常常在除夕就包好了，除夕之夜一过，饺子就可以下锅了。

在食用年夜饭之前，先要祭灶，就是要分出少许的年夜饭，献给去世的祖先，以纪念他们。古人在包年年初的饺子时，会把一枚铜钱包在其中，谁吃到它，谁新的一年中运气就是好的。孩子们受母亲的嘱咐，不吃这个包有铜钱的饺子，非要家里的长辈吃，一家人皆大欢喜。（据《联谊报》）

《新华日报》招待战地记者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年5月。当时，由中共长江局直接领导的、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新华日报》在汉口举行招待会，欢迎从台儿庄前线凯旋的战地记者，并鼓励他们据实向军事委员会反映前线情况。

1938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众志成城、浴血奋战，一举歼灭日本侵略军板垣、矶谷两个精锐师团1万余人，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5月下旬，从徐州突围的40多名记者先后安全回到武汉。

5月27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普海春西菜社举行招待会，和战地记者们欢聚一堂，围坐在一张长形的餐桌边畅所欲言。

《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作为东道主首先致欢迎词，接着由《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代表报社致慰问词。他表示，在徐州突围时，不仅担心《新华日报》特派记者陆诒的安全，也担心其他各报记者的安全，“现在见到你们安全地返回汉口，由衷地高兴”。他说：“诸君在前方看见许多的实际问题，当不限报纸上所发表的，如我军抗战许多英勇事迹，如民众的动员和组织不够深入，军民的关系还不够密切，民众疾苦，还有许多没有解决，粮食运输问题还有种种困难，所有这些问题都希望诸君写些报告发表出来；这不仅是个人的希望，而且对于地方行政当局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最后，此次诸君在前方的工作中表现出空前团结。大家相互关心相



《新华日报》战地记者招待会合影。

互帮助，这种互助团结的精神，不仅是新闻事业取得胜利的保障，而且是民族解放胜利的保障。”

范长江在发言中说道：“过去各个报社只是对他们自己派出的记者进行慰问，没有一个报馆会对我们举行全体慰问的。今天《新华日报》不仅慰劳他的记者陆诒先生，而且慰劳我们大家，使我们非常兴奋和感谢。今天下午青年记者学会对于我们全体举行慰劳，都是以前所

没有的，新闻界由狭隘的活动变成广泛的职业的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范长江还报告了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在第五战区成立分会的情况，表扬了华侨记者在战地的出色表现。特别是华侨女记者黄薇，在徐州危急时候不顾个人安危，想留下继续采访战地新闻。同时，他还希望当局能够帮助战地记者解决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上的困难，以便使战地新闻工作做得更好。（据《人民政协报》）